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王玉平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王连娣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王玉平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0,000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711—4/K·93 定价：0.85元

K209/540

目 录

一、帝国主义宰割奴役下的中国.....	1
二、革命新高潮的兴起.....	5
三、顾正红惨案和五卅.....	11
四、罢工、罢课和罢市.....	20
五、全国同胞掀起反帝怒潮.....	28
六、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35
七、三罢斗争的结束.....	41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杀害工人顾正红的暴行，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当游行群众在著名的商业街南京路讲演和散发传单时，帝国主义巡捕公然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当场打死11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上海工人阶级带头罢工，学生、商人接着罢课、罢市，一场以五卅事件为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兴起。抗议的浪潮从上海迅速扩展到各地，全国600余座城镇的1,700万居民投入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之中，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 帝国主义宰割奴役下的中国

在60多年前的神州大地，远没有象今天这样欣欣向荣。英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手中的洋枪洋炮，强迫中国的反动政府和他们订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政治上践踏了中国主权，在经济上保护了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在文化思想上摧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信心，使中国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军阀纷纷投奔帝国主义列强，成了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和走狗，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把中国宰割得支离破碎。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重重压迫和掠夺下，过着今天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忙于瓜分世界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们，马上把侵略重心转移，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极力想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出最后一滴水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十分严重的民族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唆使各自的走狗进行军阀混战，严重地危及中国的政治统一。以曹锟、吴佩孚为头目的直系军阀，背后的主子是英帝国主义。以段祺瑞为头目的皖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头目的奉系军阀，背后的主子是日本帝国主义。另外，还有与法帝国主义有关系的桂系军阀。粤系、黔系等军阀也都各有各的主子。从1919年至1925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表面上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起着巨大的作用，可实际上盘踞在各地的军阀，毫不把它放在眼里，常象下棋一样调换北洋政府的首脑。说穿了，北洋政府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玩物罢了。在战火连天的土地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更不用说整个国家的政治统一了。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租界，形成了“国中之国”，严重地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与统一。从1843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租界开始，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16个城市占有租界，又霸占沿海6个重要港口为租借地，建立军事基地。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者建立殖民体系，摆出一付主人的姿态，对中国人民施行残暴统治。以上海的公共租界为例，他们在那里设立武装的巡捕房、会审公廨[xiè xiě]、警务处等机构、执行警察、司法职务。设立工部局，行使行政权力。设立外国资本家占绝对多数的纳税人

会议，行使立法职权。中国人在那里只有纳税、干活、受统治的义务，不能集会、结社，也不许随便发表议论和出版刊物，没有一点儿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工部局利用各种名目，向生活在租界里的中国人横征暴敛。在涉及中外当事人的官司中，会审公廨总是毫无道理地重罚中国人。手拿棍子腰别手枪的巡捕，凶神恶煞地站在街头，常常无故地殴打和拘捕行路的中国人。在租界里，种族歧视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黄埔公园居然挂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生活在租界里的中国人，简直和亡国奴没有区别。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大肆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经济陷入绝境，严重地威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外国资本家已不仅仅满足于向中国倾销商品，许多外国银行在中国开设了自己的业务机构，从1914年至1926年间，共设立了16个总行，50余个分行，其中绝大多数是在1917年以后设立的。这些银行除执行本国政府的命令，借款给各派系军阀，豪[huàn唤]养这些走狗外，它们还从事中国的金融投机与地产投机。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与财政，使中国的民族经济成了它们的附庸。许多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设厂，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原材料与廉价的劳动力。外国资本主要集中于纱厂、烟厂、煤矿、铁矿、电力工业和轮船运输业，并且形成了垄断局面。这些外资工厂凭借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的优势，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用“合资”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吞并和控制了许多中国人开办的企业。在各行各业中，尤以纺织业日本资本家干得最为恶

劣。仅在1921至1922年间，日本就在上海、青岛新增设了9个纺织公司，并在原有的纺织公司中增设了5个纱厂和1个织布厂。到1925年，日资纺织厂的纱锭数已占中国纱锭总数的45.3%，分别超过了民族资本和其他国家资本的锭数，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日本资本家增设新的企业，实际上不过是乘中国民族资本家遇到暂时困难时，强取豪夺地把太阳旗插在了中国工厂的大门上。外国资本家的作法，简直和强盗没什么两样。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兼并，中国资本家无不战战兢兢，生怕外国资本家看中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企业，逼得去跳黄浦江。他们憎恨外国资本家，可又无力反抗，心中的火无处发泄。如果听任外国资本在中国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很快就会破产，中国的企业都会被插上五颜六色的外国旗。

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阶级实行野蛮奴役和敲骨吸髓的剥削，严重地损害着工人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在劳动时间方面，当时工厂名义上施行12小时工作制，许多外资工厂施行14小时工作制，活多时甚至让工人干16小时到18小时。在全部工作时间内，工人总共有15分钟的轮班吃饭时间，完全没有休息时间。许多工厂连大小便都要领牌子。由于牌子少人多，许多工人都尿过裤子。工人们厂房里、矿井下不停地劳动，稍有停顿，就会受到监工的打骂，有时还会被扣工资或开除。

帝国主义者的倒行逆施，在上海人民，乃至在全中国人民心中都积着无以复加的深仇大恨。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

帝国主义和军阀相互勾结的黑暗统治，中国各阶层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宰割奴役的愤怒，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郭沫若以他那诗人的敏感，预见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说：

“就在这静安寺的街道中央，

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发！”

静安寺就是上海公共租界上，外国人住宅最多的一条街道。

二、革命新高潮的兴起

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向罢工工人下毒手，残杀工人领袖林祥谦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使1922年1月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受到挫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意识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打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之路。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1924年1月，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林伯渠、瞿[ǒu]渠]秋白等23名中共党

员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李大钊等人的协助下，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做出了新的解释，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决定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中国革命开始从低谷再一次走向高潮。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内部发生政变。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因禁靠行贿上台的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从广州到北京来商讨国是。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北上，号召全国人民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1924年11月4日，孙中山北上，在他的《北上宣言》中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的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响应这一号召，上海、浙江、广东、湖南等地人民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3月，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兴起了一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

在革命运动复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为迎接革命高潮作了准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积极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共必须积极领导工人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努力发展工会组织，壮大无产阶级力量。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一大批得力干部被派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加强这些大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例如湖南工人运动领袖、安源大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李立

三,工人运动理论家邓中夏,京汉铁路及湖北工人运动领袖项英同时都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主管宣传的瞿秋白、蔡和森,主管妇女工作的向警予、杨之华也都把工作重心转向了工人运动。邓中夏等人非常注意运用安源等地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开办了许多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由孙中山的战友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的上海大学派出许多学生,到这些学校教工人认字,宣传革命道理。通过这些青年学生使《向导》、《中国青年》、《前锋》等革命刊物在工人中广为流传。通过学习,工人懂得了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工人阶级要团结反抗的道理。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以工人俱乐部名义出现的初级工会组织在许多工厂中建立,成员有数千人。在日资同兴、内外棉等纱厂中,也秘密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人党员陶静轩、戴器吉、刘华等人都成为当时上海工人活动中的中坚分子。这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跃进。

在众多工人俱乐部中,沪西工友俱乐部办得最为出色。俱乐部经常举办讲演、游艺、读报、部员救济、职业介绍等活动。在举办这些活动的同时,革命道理象春雨入地一样无声地滋润了工人的心田。取得了不少工人,尤其是沪西日资纱厂工人的信任与拥护。工人们迫切希望俱乐部替他们出来做主,领导他们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改变自己难以忍受的惨况。

1925年2月2日的早晨5点钟,在日资内外棉纱厂第8厂粗

纱车间做夜工的小童工们，已经连续劳动了11个半小时，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下班了。一个12岁的小姑娘累得疲惫不堪，不由自主地靠在机器旁打起盹来。一个日本监工象小偷一样悄悄地溜进车间，当人们看见他时，他已经走到小姑娘的跟前，嘴里骂着“八格牙鲁”，上去就是拳打脚踢，打得小姑娘鼻青脸肿，蹲在地上呻吟，血从裤管里淌了下来。同车间的工人们都斥责打人的监工，男工们都要求厂方处理他。日本厂方蛮横之极，不但不承认打人行凶的错误，反而宣布开除上夜班的50名男工。日班的男工听到这一消息，连工也没上就决定和夜班的弟兄们共患难。被开除的工人要求结算工资，反而被送到租界工部局的会审公廨。公廨的英、美洋法官和日本资本家是一丘之貉，居然判决1名工人代表监禁，5名训斥。

面对毫不讲理的帝国主义者，许多工人群众找到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带领工友进行斗争。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接到消息，十分重视工人的要求，特地组织罢工委员会，派邓中夏、李立三负责具体工作。同时号召党团员支援工人的斗争。经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组织，9日下午4时日资内外棉纱厂第5、7、8、12等厂的工人们同时退出工厂，举行了罢工。一万多工人集合在一起，选举出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会，组织纠察团，发表了罢工宣言。“反对东洋人的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喊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心声。14日，罢工超出了内外棉纱厂的范围，开始向大康、丰田等日资纱厂扩大。至18日，全上海22家日资

纱厂的3.5万名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每个工厂的罢工宣言都表示要支持其他厂工人的斗争，同时也提出了各厂工人的不同要求。

罢工开始后，日本资本家和日本政府一面气势汹汹地向中国军阀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奴才们镇压工人。一面派军舰驶入上海吴淞口，恫吓罢工工人。奉日本资本家之命，租界工部局和中国的淞沪警察厅互相配合，搜捕工人领袖，禁止报纸刊登罢工消息和支持工人的言论，布告严禁罢工。邓中夏、孙良蕙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被逮捕，沪西工友俱乐部被封闭。就连著名的国民党人，《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也被传讯，指控他刊登罢工消息。

高压政策吓不倒上海的工人阶级。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会积极在工人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动员工人参加纠察团和义勇队。纠察团员和义勇队员每10人编一组，分级设有什长、百长、千长和总队长。他们都宣誓：“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占面子不上工。维持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在巡视厂区、维持秩序、传递消息、宣传鼓动方面，纠察团员和义勇队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工人罢工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支援。共产党员向警予领导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召集各工厂、学校和沪西四马路商界联合会等47个团体开会，成立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呼吁上海人民为中华民族争人格，抵制日货，援助罢工工人。后援会配合工人斗争，展开向警察厅交涉、营救被捕工人领

袖、为罢工工人募捐等活动。青年学生组织的后援队活跃在街头巷尾，散发传单、演讲、募捐。反帝爱国口号激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在上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支援罢工工人抵制日货的热潮。

工人的罢工和全上海市民支援罢工抵制日货的活动，使日本资本家在经济上直接受到打击。据上海日本资本家的组织商工会议所统计，日资纱厂因罢工而损失白银数十万两，仅利润每罢工一天就损失1.46万两。抵制日货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眼见每天损失白花花的银子，想到即将形成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一向骂中国工人是“贱种”、“奴才”的日本资本家心虚了，他们不得不破天荒地和工人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进行谈判。

2月25日，工会代表张佐臣等6人去上海总商会，和日资内外棉纱厂资本家谈判。26日，日本资本家低头答应了工人的条件：不许无故打人；不许无故开除工人；依照工作的好坏增加工资；发还工厂强制扣押下的储蓄金。27日，警察厅释放了被捕的工人领袖。受难的领袖们坐在马车上，数千名工人用掌声、欢呼声和鞭炮声欢迎他们的胜利归来。3月2日，日资纱厂的中国工人复工。日资内外棉纱厂全体工人举行了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工会代表刘华公布了谈判结果，工人们欢呼，用热烈的掌声庆祝胜利。工人上工时，日本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小监工在工厂门口列队欢迎，监工们又是放鞭炮，又是鞠躬。工人个个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工会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树立了威信。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李立三、邓中夏、项英、刘华、孙良蕙等工人领袖的威望越来越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会组织日益壮大，很快就发展成为上海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三、顾正红惨案和五卅惨案

2月罢工的胜利和上海地区工会组织的发展，引起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恐慌。他们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工人力量的壮大和自己的失败，一心要迫害工人群众，镇压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日本政府及其驻华使领馆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不断要求中国军阀政府和地方官员取缔工会，“早日绝其祸根”。4、5月间，市场上的棉价高、纱价低，日本资本家认为这是个大好时机，撕毁了2月罢工时和工人签订的协议，又开始打骂工人，并克扣工人工资了。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业资本家开会决定：不承认工会，工人如果罢工就关闭工厂。

为反击日本资本家背信毁约、联合行动进攻，李立三、邓中夏等工会领导人决定为工人撑腰。根据当时的总形势，工会制定了各日资纱厂工人轮流怠工，相互支持，共同抵制日本资本家反攻的斗争策略。从5月初，日资内外棉纱厂的第3、4、8、12、15厂和同兴纱厂1厂、日华纱厂4厂的工人根据统一部署，开始怠工，此起彼伏，没有间断。日本资本家先利用巡捕和警察恫吓工人，没取得一点儿效果。转

而又采取开除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出厂的手段，企图一箭双雕，既破坏工会组织，又恐吓工人，达到破坏怠工的目的。

5月11日，内外棉各厂宣布开除30名工人出厂。5月14日，内外棉12厂又以“散布工会谣言”为理由，开除两名工人代表出厂。工人向日本厂方提出质问时，却被日本监工用铁棍毒打，有5人受伤，5人被抓入巡捕房，还有5人被开除出厂。

日本资本家欺压中国工人的消息迅速在工人中间传开。工会决定12厂工人罢工抗议，其他各厂工人仍然上班，坚持怠工斗争，打破日本资本家企图关闭工厂、和工人打消耗战的阴谋。工人们一致拥护工会的决定。

5月15日，日资内外棉7厂的日班工人照常进厂。厂方说因为12厂工人罢工，不能供应棉纱，无法织布，让工人统统回家，工厂关闭停工。工人看穿日本资本家要和工人打消耗战的阴谋，坚决不同意停工。经过巡捕房巡捕头的“调解”，厂方同意停工期间照发工人工资。日班工人以为斗争有了结果，就离开了工厂。谁知刚一走出工厂，日本资本家就把大门锁上，在大门上贴出布告，宣布工厂停工，只字不提工资照发的事。根据以前日本资本家毁约和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根据工会决定7厂工人坚持上班怠工的精神，工会积极分子顾正红等人就分头到夜班工人家里串联，动员大家不理睬厂方的“布告”，坚持上班，并互相约定提前到厂门口集合。

当天下午5时左右，内外棉7厂数百名夜班工人在顾正红等工会积极分子的带动下，不顾厂方的禁止，聚集在厂门

口，要求进厂做工。到6时，工厂还是紧闭大门，顾正红带着几个青年工人猛敲大门。工人们则齐声大呼：“快开门，我们要上工！”厂里日本人隔着门说：没有纱，经理叫你们统统回去，过两天再来上工。工人们齐心合力撞开大门，涌进了工厂。这时工人们才发现内外棉纱厂的副总经理元木和内外棉7厂的经理川村带领印度巡捕、日本监工等一帮打手，摆开阵势，正迎面向工人走来。他们个个手持棍棒、手枪、尖刀，杀气腾腾，蓄意要屠杀工人。工会积极分子走在前面，带领工人毫不畏惧地向前走着。顾正红走在最前面，他愤怒地向日本经理喊到：“反对东洋人关厂压迫工人，不开工就发工钱！”工人们都随着顾正红喊了起来。川村两眼瞪得通红，一看带头人是顾正红，便凶狠地向他开了枪。第一枪打中顾正红的左腿，第二枪打中他的肚子。紧接着又开枪打中了他的头和胸。其他日本人又上前用尖刀向顾正红猛刺，使他倒在了血泊里。川村的开枪，成了日本人行凶的信号，随着枪声，棍棒、洋刀等一起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打去。数百名工人用身体抵抗了一个多小时，紧紧地包围了这些刽子手。由于巡捕房派来大批巡捕，才给打人的凶手们解了围。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使用最野蛮的方法，残酷地镇压手无寸铁要求工作的中国工人，工会积极分子顾正红因伤势过重，17日晨停止了呼吸，当时他年仅20岁。另外，还有7名工人被日本资本家打成重伤，数十人受了轻伤。对于这次流血事件，人们都习惯地称之为“顾正红惨案”。

顾正红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上海地委就决定派李立三

到惨案发生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将惨案公布于众，揭露日本资本家的狰狞面目，争取全社会的支持，发动“一场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中共中央两次发出通告，呼吁各界人民群众援助工人。上海各界35个团体首先响应，组成“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共同抗议日本资本家的血腥暴行。5月18日，工人们在沪西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门前的空地上为顾正红搭起灵台，整队迎接他的灵柩。前往吊唁和慰问的工人、学生及各界人士络绎不绝。集会、讲演的气氛都十分悲壮激昂，催人泪下。“要行凶者偿命！”“誓死坚持到底”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为扩大政治影响，为唤起更多的人投入反帝运动，李立三、刘华、陶静轩等工会干部组织了公祭顾正红烈士的追悼大会。5月24日，在军警的严厉监视下，4000多人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赶到潭子湾，参加了追悼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顾正红的遗体停放在黑漆的棺材里。棺材上覆盖着一块白绸，8个大字“东洋人打死中国人”用毛笔写在绸子上。挽联、挽词、传单都挂在两侧，多得数不胜数。“为顾正红烈士报仇！”“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誓死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口号响彻云霄。会场气氛悲壮。各界代表和工会代表的讲话都痛斥了帝国主义者屠杀工人的暴行，决心要与帝国主义血战一场。

顾正红惨案在上海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各校学生纷纷发表宣言，散发传单，为工人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的斗争。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发出“抵制日货”的呼吁。打倒帝国主义的